

我知道中外学者有一些关于传记研究的学术专著,可惜我一本都没看过。所以如实地讲,我对于传记理论的确是一窍不通。但是,40余年来,我曾多次进行传记写作的实践,切身经验和教训倒还确实有些,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回忆。

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叫《许广平的一生》,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个读者是陈翰笙老人。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学者,擅长于世界经济史和农村经济研究,鲜有人知道他还是党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鲁迅甚至一度误以为他跟《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一伙的。他认为,有必要为鲁迅夫人许广平立传,因为鲁迅跟许广平相结识的10年,其创作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其中也有许广平这位“无名英雄”的功劳。陈翰笙老人还给他的挚友宋庆龄写信,希望她能为此书题写书名。不巧当时宋庆龄胳膊受伤,便转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题写书名。我去廖大姐家时,她正在吃饭,听说是宋庆龄所托,放下饭碗就握笔疾书,顷刻即就。通过这一细节,我切实感到宋庆龄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许广平的一生》是关于许广平的第一本传记,在写作中得到了周海婴先生、常瑞麟大夫等许广平亲友的大力支持。海婴先生为我提供了他母亲未完成的自传文稿《我的斗争史》,以及一些尚未结集出版的许广平文稿。常瑞麟大夫是许广平的闺蜜,作为见证人,她跟我讲述了许广平初恋的经历。在鲁迅博物馆资料部,我还发现了许广平的未刊稿《风子是我的爱》和《魔祟》。如果读者感到这部关于许广平的第一本传记有些新意,首先应当感谢许广平的亲友和有关单位。这本传的不足是对于许广平的后半生叙述过于简略,其中有我自身的原因,也有不难理解的客观原因。

我第二次写作传记的尝试也是在1981年。当年正值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中国青年报》开辟了一个专栏,要分16次连载鲁迅生平,每期3000字,要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最好每次都讲一个小故事,以便吸引年轻读者。该报原约来稿的作者不能按时交稿,临时让我“救场”。出面找我的编辑叫顾志成。我知道她当年受团中央委托,亲自去湖南,营救因写作《第二次握手》而险遭不测的青年作家张扬,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这组文章扩写之后,于198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民族魂》。封面用的是沈钧儒题字,其女公子沈谱加盖了他父亲的印章,以显庄重。此后,至少有5家出版社更换书名出版了这本书,成为了我个人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此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予以连载,《解放日报》又曾予以连载。2012年,中国作协启动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这一大型丛书工程。我因有写作《民族魂》的基础,曾编撰过《鲁迅年谱》,又采访过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积累了一些口述资料,便申报了写作《搏击暗夜——鲁迅传》这一课题。获准之后,经过三年努力,于2016年1月出版了这部传记。

我写作传记的第三次尝试,是1988年在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宋庆龄传》,经修订增补后于2012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目前又有一家出版社准备第三次出版,正在送审之中。这是我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的成果之一,因此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宋庆龄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宋庆龄的传记审查时间最长,把关最为严格,我在写作时也格外慎重,紧紧把握她既是“人”更是“伟人”这一基本特征。这部传记开头一章《韩家故里》,率先披露了宋庆龄父亲原本姓韩不姓宋这一史实。这是我专程去海南文昌进行“田野调查”的学术收获,当时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鲜感。我也尽个人之力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采访了宋庆龄的多位友人和秘书,从中获得了不少口述史料。近年来有关宋庆龄的新史料披露了很多,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宋庆龄纪念机构保存整理的信件和档案,这是我当年难以看到和发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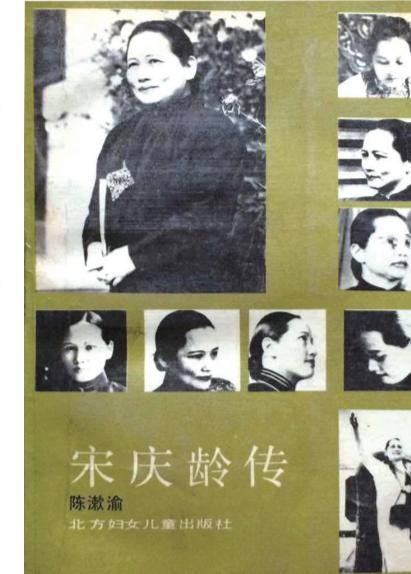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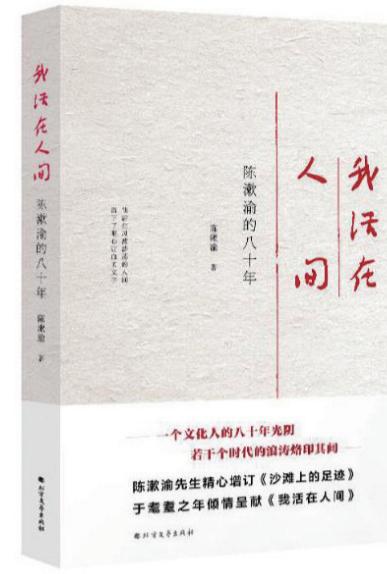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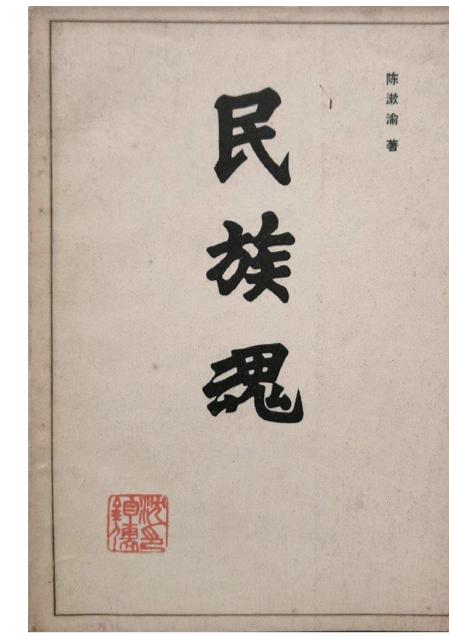
我在传记写作领域的第四次尝试不是写他传,而是写自传。这本书初名为《沙滩上的足迹》,于2011年1月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8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经增补后改名为《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于2019年9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之所以写自传,一是因为机遇,东方出版中心要出“学人自传丛书”、文史出版社要出“政协委员传记丛书”,主动前来自传。二是因为当时陷入了一些学术论争和人事纠葛,想趁此机会把事实真相和个人看法说出来,也带有一定的自辩成分。

中国的文史著作多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即使是《史记·列传》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凡夫俗子。司马迁将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史记》中专写王侯贵胄的“世家”一类,更成为石破天惊之举。古代文学家韩愈写过《毛颖传》,柳宗元写过《种树郭橐驼传》,虽写的是小人物,但根本上属寓言性质,不能列入正宗的传记文学范畴。前者将“笔墨砚纸”拟人化,后者以种树的方法比拟“治民”的方法,以供官吏们鉴戒,并不是真为劳动者立传。也许是受传统观念影响,鲁迅曾谢绝友人的建议,不同意撰写长篇自传,理由就是“我的一生太平凡”。

为平凡人立传,或认为平凡人也可以立传,这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一种新观念——用“人权”取代“神权”,率先将这种观念引入传记文学领域的是胡适。1919年12月,胡适撰写了《李超传》。李超是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生并没有任何轰轰烈烈

史传即历史 ——传记写作的回忆和感悟

□陈漱渝



烈的事迹,1919年8月因肺病逝世于北平法国医院。胡适通过这个普通女生普通的一生,让读者思考女子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宗法社会“无儿即无后”的观念问题以及“男女平权”的社会问题,使简短的传记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胡适的《李超传》议论文性弱,文学性弱,但开创了为平凡人立传的先河,可谓功不可没。平凡之人即使平凡如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时代的面貌。近些年来,我看到有些杂志组织作者为普通人写传,也目睹有不少老人到报社自费打印个人的回忆录。我认为,留下这些集体记忆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认为无历史细节即无历史,“最是细节动人心”,而这些历史细节大多保存在“野史”和“凡人”的记忆之中,可跟正史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一座坚不可摧的历史大厦,终究是要靠那些坚实可信的历史细节支撑的。

据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介绍,“传的名目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类型不同,写法当然各异。在所谓“评传”当中,作者可以对笔下人物进行评价,相当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般读者对于传记的普遍期盼,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不过在我看来,写史传就是写历史,史传即历史。顾及文学性是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而不是改写历史。有人认为传记中涉及传主的事件必须绝对真实,而对次要人物的描写则允许虚构,对局部细节可以想象加工,只要符合事物的发展逻辑就行。我在写作传记过程中感到这个分寸极难把握——作者自认为符合逻辑,读者不一定认为符合逻辑;作者自认为是合理虚构,读者不一定认为虚构合理。所以,通过想象虚构的传记只能视为文学性读物,史传的基本要求是“非虚构”。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文学性传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要低于史传。只不过史传可以作为历史看待,作为史料引用或立论,而文学性传记只宜视为鉴赏性读物,尽管其价值可能胜于平庸的史传。我在传记中增强文学性,主要是靠锤炼语言,提炼情节,在叙事技巧上下功夫,对传主及其同时代人的描写都要求言必有据,尽可能做到不溢美,不隐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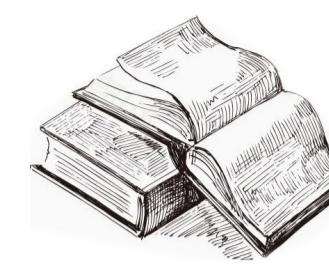
史传的基础是史料。史料是指经过考证鉴别之后的资料,包括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资料需要考证鉴别是因为其提供的“事实”有真有假,或真伪杂糅。比如在中国的文献史料当中,伪书伪文就不少,有人是想“托古传道”,有人则是为哗众取宠。清代学者姚际恒写过一部名著《古今伪书考》,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笔者也写过一篇《论作伪》,发表于1981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口述史料虽可印证并补充文献史料,但其中也普遍存在程度不同“误、伪、隐”的情况,笔者于2008年曾在《文学自由谈》第四期发表《试谈回忆录的鉴别》一文略抒己见。实物资料中的赝品(即假文物)古已有之,今为烈。近些年拍卖的名家手迹、书画和物品,很多都存在不少疑点,网络上不时出现的名人语录、轶事、日记等等,有些是为了吸人眼球、博取流量,有的则已构成名誉侵犯和恶意陷构。

在意识形态多样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对人物的评价自然会见仁见智,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共识。在传记写作领域中,作者对传主的理解和褒贬,也会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流露在字里行间。在传记文学创作领域中,当然同样需要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但我认为在史传类作品中,最为忌讳的是“为传主代言”。把对传主的个人理解和评价写进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当然可以,但通过传主之口表达作者本人对当下现实的感受就显得有些不妥。借古人的嘴说今人的话,这种艺术手法鲁迅也采用过,那是表现在《故事新编》这部新编历史小说集中,属文艺创作范畴,不能作为史传看待。

关于传记写作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有人从根本上反对客观真实的存在,认为“真实是没有的”“真实没法表现”,进而指出“传记、回忆录,到头来不过是小说”。对于这种相对主义的传记观,我在其他文章中曾予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华夏文明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的,因此,人物传记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人格引导意义。本期特约中国作协全委会原委员陈漱渝、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展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西篱,结合各自的阅读经验与研究体验,集中探讨人物传记的写作标准,为我们推荐优秀的传记作品。

——编者



凝望一个时代的背影

□全展

相传作为画传(亦称图传)的一种,是一种文字较为简练、照片丰富而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传记。《我为他们照过相》(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一部相传,其中的“我”是资深编辑型作家、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张昌华。在近40年的编辑生涯中,他酷爱文化名人卓尔不群的“背影”,凭借天时地利人和频频走近名流雅士,用傻瓜相机“咔嚓”一下而雁过留声,为文化名人拍过照的便多达150位。“他们”是书中103位相主,其中既有苏雪林、巴金、张允和、柯灵、张中行、萧乾、周而复、梅志、吴祖光、刘以鬯、杨苡、聂华苓、文洁若、宗璞、余光中、浩然、邵燕祥、董桥等文坛大咖,又有刘海粟、吴作人、黄苗子、张充和、丁聪、方成、吴冠中、齐白石等艺术家;既有钟敬文、施蛰存、周有光、施士元、季羡林、金克木、钱伟长、戈宝权、冯亦代、王世襄、周汝昌、范用、成露茜等著名学者、科学家、出版家,又有作者称之为“无影有痕”的10位前辈——因种种原因而照片缺失者——他们是茅以升、冰心、钱锺书、杨绛、周楞伽、华君武、杨宪益、夏志清、王爰生、冯其庸。“我”与“他们”,可谓谈笑有鸿儒,因书而结缘,亲承警教,曾经风雅,堪称人生幸事。

全书收入照片、名家书画手迹等共215幅。这些照片虽未全发黄褪色,但与著者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手迹、印章、绘本等相互参照时,却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审美享受、想象空间和心灵体验,更给人以强烈而又逼真的触摸鲜活历史的感觉。如同陈思和所期望的“图传并列,追求双美”那样,有引人入胜之妙。张昌华曾为周有光先生拍过很多照片。而他最为得意的是为102岁高龄的周老抓拍的一张摸脑袋的照片,极具艺术个性。相主早年是经济学家,中年是语言学家,晚年是思想家。他勤于思考,观点独特,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书中收录有先生105岁给作者的一幅字:“语文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老骥伏枥,令人感慨万千。在张昌华的记忆里,他曾先后五次赴朗润园拜谒季羡林,与季先生的照相故事令人忍俊不禁。第一次拍照,他手忙脚乱,忘记了操作程序,镜头始终打不开。一旁端坐的季老为宽慰他,不时整衣服冠,“我越急便越乱,越乱越打不开镜头”,最后不得不红着脸把相机塞进包里。第二次去拍得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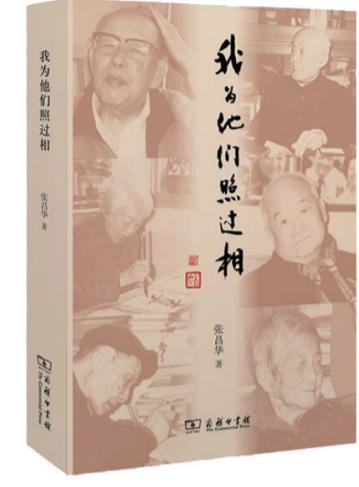
尽兴,“我先给季老拍生活照,请老人摆出各种姿势:伏案挥毫的,与波斯猫亲昵的……”

可回到图片社冲洗时,竟然发现“胶卷未装上”!不久,“我借送样书给季老的机会想照相。拜访那天,恰季老正患眼疾,老人家说下次吧”。等到下次,“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相机一摸,天哪,相机竟丢在商教授家!幸好同行友人带了相机”。真是跌宕起伏,柳暗花明。柯灵清风两袖,道骨一生,且在道德文章方面,给作者教诲良多。作者述说他俩“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往事,凸显相主的谦恭与坦诚。“读书心细丝抽茧,炼句功深石补天”,这是柯灵悬于书房的一副对联,也是他创作的座右铭。张昌华特地请他坐在对联前拍照留念,对老辈文人艺术创作的顿悟,对人文精神的传承,见微知著,令人动容。

摄影史家阿兰·特雷西腾伯格说,照片是“文化文本”。它试图传达一定的意义,阐释特定的历史时刻,因而讲述老照片成像背后的故事,就能回望一个时代的背影,或多或少能窥见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某些社会信息的雪泥鸿爪,也可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

特别是书中展示的一些或偷拍或抓拍的照片,其历史真实感和现场直击感无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的震撼,那是光看文字或光看照片所不可能达到的。如书中写到腿脚不便的范用去看望师母金玲。车开到山坡下,范用请司机停车,坚持拄杖一瘸一拐走到陈府。进门一见金玲,范用亲切叫了声“师娘”,其实金玲比他大不了几岁。“金玲让范用坐下,范用说先看看老师。小灵堂设在金玲的卧室里,在陈白尘的遗像前,范用恭敬敬礼。敬礼了三个九十度大躬。”寒暄后,金玲急急向范用述说陈老“文集”的钱上面还没批下来,出版社不见钱不开工。范用见金玲的悲苦状,眼睛霎时红了起来,我拍下了这张照片。”真是一图胜千言,情深处催人泪下,令人百感交集。再如在香港陆羽茶社偷拍董桥的一张照片。原来董桥平时讨厌拍照,也没有什么生活照。当出版社告知他的《旧时月色》纳入一套丛书,要求作者提供照片以便图文并茂易于发行,可他却不愿妥协,宁肯此书不出版或不列入该书系出版。从而显示出一个不事张扬、有韧性、有个性原则的董桥。

不同于陈思和的《巴金图传》、林贤治的《鲁迅画传》等全传式作品,《我为他们照过相》属于散传,或片传。它不采取编年史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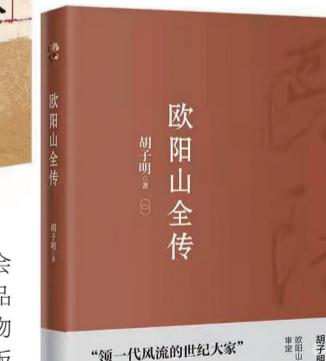


时序记叙法,做历史的宏大叙述,写传主一生,求其全面系统,而是采取板块式艺术结构,截取其人生一横断面来写,即以一图一文的形式,集中墨笔叙写为传主照相之前后“素描”“影痕”“雪泥鸿爪”。作者善于从看来平常的生活琐事中深入发掘趣味性的東西,那些细节富有生活情趣,或折射着时代光亮,或闪烁着灵魂异彩,或凸现着个性特色。一经作者的生花妙笔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写出来,便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刻画出相主的精气神,俨然成为了一尊尊立体的精神雕像。诸如袁世凯的顺其自然、施蛰存的率真可爱、胡絜青的待人厚道、施士元的低调务实、吴祖光的睿智幽默、季羡林的高风亮节、萧淑芳的活泼俏皮、金克木的大雅大俗、黄苗子的重义重情、王世襄的民国范儿、梅志的坚韧刚强、吴祖光的秉性耿直、杨苡的潇洒慈祥、聂华苓的率真善良、文洁若的谦逊和蔼、华君武的外圆内方、冯其庸的襟抱宽广等,都因作者从人性美、个性美和语言美的精心提炼加工,从而对读者产生富有艺术张力的审美享受。即如书中“最后的素描”一辑中的10位相主,虽然他们业已远去,其风骨行状,已凝固成画面,定格在人们记忆的底片上。

继《我为他们照过相》之后,张昌华又推出其姊妹篇《他们给我写过信》,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相参照互文阅读,凝望一个时代的背影,仰视文化名人的做人之道、待人之厚,钦慕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之严、处事之忠,踵武前贤,不亦说乎!



近日,由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创作的两部传记文学作品《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欧阳山全传》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近日,由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创作的两部传记文学作品《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欧阳山全传》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传记文学叙事的创新探索与经典的永恒魅力

□西篱

我们的当下勾连,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历史从来不会消失。历史中的人物和巨大能量,经由我们的追忆和反思,依然有着火把一般的光芒,照亮来路,指向未来。历史也并非是固化的。作者的思想情感境界、文学价值追求和历史观,决定了历史中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能在升华的同时给予读者深深的影响。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詹谷丰对众多中国左翼文学的岭南血脉的梳理,对时代精神的回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他诗化的文字将我们点燃,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度感受到作者与他所回忆和塑造的人物的重合与融合,仿佛他和他们一样,为铁血硝烟的时代和青春觉醒的理想信念与激情,发出深深的叹息。本书还带给我们这样的启迪,传记文学的文体形态是多样而丰富的,其叙事手段的创新和实践有待作家探索。

随着中国左联的影响日渐扩大,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左联组织。广州左联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其首任领导人是作家欧阳山,他在延安时期曾亲聆毛泽东文艺思想,其创作长期坚定不移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毛泽东予他的亲笔致信,目前仍保存在广东省作协10楼展厅。从延安时期革命文学实践结果的《高干大》到时代巨著《一代风流》,他始终坚持以中国的民族风格为主体,杂糅某些“欧化”东西并汲取中

古代和民间艺术精粹,使其作品体现出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的融合性艺术风格。他的《一代风流》既有着《战争与和平》的广阔,又有着《红楼梦》的旖旎(刘白羽语)。欧阳山笔下所塑造的高干大、周炳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关于欧阳山的传记,此前有其外孙田海蓝著《欧阳山评传》以及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著《欧阳山传》。前者侧重于亲人感知,后者侧重于作品研究。唯胡子明花费二十多年心血完成的《欧阳山全传》,资料翔实、文笔优美,较为客观地描述了欧阳山横跨新旧两个时代,为中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奋斗终身的人生道路和他勇于探索、独树一帜、有着鲜明个人风格和特色的文学创作历程,真实地还原和展示了欧阳山既坎坷曲折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图景。胡子明作为欧阳山的创作助手,在他身边工作了近10年。他创作不多,曾经潜心于鲁迅研究,完成《欧阳山全传》是他数十年来的心愿,是情感和使命感的推动。书中关于欧阳山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密切交往的叙述,与郭沫若多次交往的叙述,真实、生动、细腻,大量第一手资料史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并存。作者的叙事方式和行文风格,神似欧阳山,情感饱满而又克制,言及传主人生历程和精神历程反复敲击求证,格外严谨准确。欧阳山对学生、助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文学创作探索上与当下传记文学创作真诚、严谨的品质追求并无隔阂。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